

# 文学“超托邦”：科玄并置的科幻视界

徐新建

(广西艺术学院, 广西南宁 530022)

**摘要:**以现代中国的科玄之争为贯穿,讨论科幻关联的知识论意义。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内在呼应,前后连接。“科玄”是科学与玄学的简称,并置使用,表示二者的相互纠缠,以及由此衍生的世纪论战。“科幻”是科学幻想的简述,代表想象延伸及跨界组合,在创作实践方面包括了从文学、电影到动漫、网游等多种类别,特点是将抽象实证与具象虚拟组合为一,构建出参与现代世界的社会竞争及人类升级的新表述类型,亦即本文所称的“第三文化”,或曰想象构造的“文学超托邦”。

**关键词:**科玄之争;文学“超托邦”;科幻知识论;数智文明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24)05-0059-09

**DOI:**10.13713/j.cnki.cssci.2024.05.017

## 引言

人类是会讲故事的动物;人类需要故事。

故事是一种知识;知识会变成故事。

20 世纪开启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概念及其关联的技术实践,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革新及其相关的表述转变。除了“赛先生”(science)与“德先生”(democracy)的著名标志外,值得回顾追溯的还有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

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内在呼应,前后连接。前者是科学与玄学的简称,并置使用,表示二者的相互纠缠,以及由此衍生的世纪论战。后者是科学幻想的简述,代表想象延伸及跨界组合,在创作实践方面包括了从文学、电影到动漫、网游等多种类别,特点是将实证科学与虚拟叙事连在一起,构建出参与现代世界的社会竞争及人类升级的新表述类型。

以现代中国的思想演变为例,由科玄之争到科幻兴起的结果之一,是催生了连接科学与玄学的新知识范式。这是值得关注的社会事象,亦是需要深

入辨析的重要议题。

## 一、中国本土的科玄之争与科幻兴起

就思想话语的转变而言,近代中国在知识论意义上的科玄之争,触发于影响深远的西学东渐,关涉纵横交错的古今-中西多重维度。也就是说,其中既包含着本土传统的古今之变,更涉及了根基异质的中西之争。在早期,各方争辩的突出焦点,便是关涉价值与工具的体用问题。争辩的前提是先承认一种特定的知识分类,即把哲理视为“体”——价值,科技列为“用”——工具,而后做出彼此有别的排列选择:认同科技的洋务派主张实用优先,呼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守护价值的、坚持哲理信仰,强调本土古训不可动摇。后者的代表,当属张之洞等倡导的“中体西用”说。其中的“中体”,亦即与科技实证(实用)相对的纲常名教、四书五经。中体西用派提出的观点是“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sup>[1]</sup>体用之争的影响久远。多年之后,李泽厚旧

**作者简介:**徐新建,文学博士,广西艺术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四川大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文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学人类学。

话新说,重估历史,进一步提出了与张之洞对立的“西体中用”说。<sup>[2]</sup>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废除传统科举,兴办西式学堂,意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由西方引进的科学、教育及实践体系。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中,不仅经书衰落、旧学退场,物理、化学、铁道、报刊乃至政党、公园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主张科技优先的维新派日益占了上风。

时至民国,随着西方科技在中国本土的进一步推进蔓延,终于引发了知识界针对科玄问题的再次争辩。

1923年12月,留学过日本与德国的张君勱应人类学家吴文藻之邀,在北京的清华中学发表演讲,向预备出国的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科学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吗?<sup>[3]1-7</sup>

张君勱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万能”的认知提出批评。他的看法是,科学是客观、无我和统一的;相对而言,人生观是主观、有我且自由的;科学讲究归纳分析,人生观凸显直觉综合;因此科学不能也不应替代人生观问题的思辨和解决。<sup>[3]1-7</sup>张氏的演讲稿随后发表,接着就引发了胡适谓之“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sup>[4]8</sup>张君勱被封为“玄学鬼”,并由此派生出以科学和玄学对立冲突的两大阵营。<sup>[5]8-26</sup>

“科学”是什么?当年的解释纷繁不一。依照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概括,科学的特征在于以物质为对象,进行旨在求真的客观推论,从而“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sup>[5]8-26</sup>,由此形成胡适所言的,可以“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sup>[4]8</sup>的科学知识论。不过在后世一些论者看来,或许正因为要与被视为“玄学鬼”的势力殊死对抗,丁文江那批科学知识论的倡导者同样存在思想和立场偏颇,即“有将科学原则加以绝对化与神圣化、使之成为‘科学拜物教’的倾向。”<sup>[6]</sup>

“玄学”一词有中西二义。就汉语传统而言,其特点被概括为“立言玄妙,行事雅远”,强调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在最早的先秦典籍里,老子的表述堪称典范,其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强调了有-无和虚-实之间的精微对应。卷入科玄论争后,玄学的含义发生转移,在留洋学者们的参与下,添加了西方传入的“形而上”思辨

(metaphysics)以及后来补充的“美学”感知(aesthetics)。

可见,若把晚清与民初的维新改良视为整体,将“清华演讲”引发的事件往后回溯,便不难看出,张君勱与丁文江为代表的科玄论争,恰好映射了“科幻中国”自晚清兴起的舞台和场景。如果说科玄之争的爆发体现了认知上的针锋相对,科学幻想的实践则展示出欲使二者并置合一的内在目标。从历史变迁及社会转型角度看,各方聚焦的要害,说穿了仍是一个,即: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洋“尖兵利器”,如何做到体用结合,救国保种。

扩展来看,后世的科学史学者将近代中国的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期不列颠学界的“两种文化”之争并提,对中西交错的认知冲突进行比较,总结说,“‘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高水准的理论交锋,对于巩固新文化运动的胜利果实和塑造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时代原因“后一目标未能实现”。<sup>[7]</sup>什么样的目标呢?超越科玄之争隐含的思想裂痕,即: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sup>[7]</sup>

由此可见,所谓“更具前瞻性的文化形态”,便是指对科玄裂痕的弥合或扬弃,继而呼唤对既有知识范式的解放和重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孕育下,兼具科学与玄学要旨的“科玄幻想”可谓应运而生,并且通过“超凡脱俗”的跨时空叙事,把目光指向了双方皆认为至关重要且虚实兼备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天下观。

其实至少与明代“万国堪輿图”的传入相同步,西方的科学技术便已在中国土壤里播撒了从观念到实用的种子。与之相关,被视为舶来之物的科学幻想也并非自当代才诞生,而是有着与西学东渐同样漫长的绵延历程。

通过翻检史料,日本学者武田雅哉与林久之认为,作为中西混合的近代产物,中国的新文学类别SF(Science Fiction),尤其是其中的主要代表“科幻小说”在19世纪便已萌发。例如,在1818年出版的李汝珍《镜花缘》里就出现了能垂直起降的“飞车”,时间比儒勒·凡尔纳的“飞翔”小说早了半个世纪。另一部名为《年大将军平西传》的作品,不仅描绘了堪称“地行船”的地底战车、载士兵和火炮升

空的“升天球”,还展现了类似于“射线炮”“镗水枪”的各种新式科学武器;非但如此,作者还让主人公——来自西洋的科学家“南国泰”乘升天球飞抵欧洲,向教皇求援,终于将反叛的“敌寇”击败于巨型机器人的超力之下。<sup>[8]29-53</sup>对此,武田雅哉等人的看法是,晚清萌发的中国科幻小说一方面延续了本土延续的奇幻传统,另一方面展现了以严复译介“天演论”为代表的“科学启蒙”众生相。<sup>[8]29-53</sup>

到了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近代中国的启蒙推动者梁启超发表了堪称“设计未来”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sup>①</sup>尽管在出版之初,作者自称其文体是三似三不似:“似说部非说部,似樵史非樵史,似论著非论著”,然事到如今却有后世学者将其追认为中国科幻的晚清首创。<sup>②</sup>王德威一边承认该作是谈论中国科幻类型的起点,同时又评价说其贡献“非常浅薄”,因为它仅仅采用了“时空投射”方式,表达“个人对未来的理想。”<sup>[9]</sup>

《新中国未来记》将故事时间放置于“西元1962年”,也就是距当时还有60年的“近未来”之际。彼时的“天下”已非四夷来朝的封贡格局,而是诸国对等的世界体系。是年,正值万国太平洋会议召开,中国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周遭的情形是无论本土还是域外,都发生了根本大变,非但帝制瓦解,工业勃兴,在科学技术推动下,世界步入了互通有无的全球时代。

于是,在梁启超笔下,玄学也罢,科学也罢,势必会最终合一,且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由科技打通的新社会需求,且得关联中外古今,兼备科学与文学,视人类知识为一整体。

结合当年严复引进“天演论”造成的深远影响来看,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不仅可视为近代中国的新小说先驱,并且称得上第一部以天演论及地球村为本底的科幻作品。该作的最大转变和突出亮点,在于宣扬了自然演化的世界观与万国相连的

人类史。这样的见解,突破了司马迁以来由三皇五帝传承的“万世一系”说,并与康有为等主张的“三世大同”论形成呼应和区别。<sup>③</sup>为此,梁启超通过作品主人公之口,不仅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以及世界分为各色“人种”的人类学思想,强调“今日全是生计界竞争的世界”,<sup>[10]44</sup>并且对波及全球的科技影响做了浓烈渲染,让改良派代表黄君发表感言,曰:

兄弟,自十九世纪以来,轮船、铁路、电线大通,万国如比邻,无论哪国的举动总和别国有关系。<sup>[10]45</sup>

在我看来,若以人类学的物种进化及全球一体的科学史观来看,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确实堪称中国科幻的早期代表。其不但标志着对王朝体制万世循环论的突破,并且超越了其后科玄之争的各自偏颇。就科幻文类的开创意义而言,梁启超的贡献,在于通过文学想象勾连科学与玄学的潜在裂缝,弥合不同知识类型间可能引发的观念冲突。再者,若将目光放回晚清的时局场景,在从严复到康有为等改良派人士的眼中,还远有比争论科学与玄学孰轻孰重更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以推翻专制及国民革新为目标的社会理想与政治改良。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发动小说界革命,主张并践行以小说方式对未来中国进行想象、描绘和传播,才会在科学影响的史观推动下,对过去、现在的社会政治进行总结,继而再对突破后新中国加以展望。

对此,《新中国未来记》勾画的科幻愿景是——以暴易暴,则革了又革,其状为循环。以仁易暴,则一革之后,永不复革,其状为进化。<sup>[10]45</sup>

此处的“进化”,即严复转译的“天演”,代表当时流行于世的科学世界观;而由此推衍的文学结果,便是梁启超笔下消除了专制体制的虚拟新中国,只不过其中的“永不复革”是种幻想,因与社会

①欧阳健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认为,“《新中国未来记》是一部开一代风气的划时代杰作,它影响了整整一代小说创作的发展进程,为晚清小说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参见欧阳健《晚清新小说的开山之作——重评〈新中国未来记〉》,《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50—57页。

②参见李欧梵《奇幻之旅——星云组曲简论》,收入张系国《星云组曲》,洪范书店,1980年,第3页,转引自陈思和《创意与可读性——试论台湾当代科幻与通俗文类的关系》,《天津文学》,1992年第2期。

③晚清时期的“三世论”经龚自珍、魏源提出,继而在康有为的论述中得到完整阐释。该说主张人间社会要经过前后演进的三个历程,即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其中的动力即为“进化”。康有为阐释说:“《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参见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21页)。相关论述可参阅陈壁生《晚清的经学革命——以康有为〈春秋〉学为例》,《哲学动态》,2017年第12期,第34—41页。



实情相悖而又被一再打破。

与此呼应,在康有为被誉为“超未来人类史”的《大同书》里,则呈现了清末文人“共同怀有的乌托邦展望”。<sup>[8]51-52</sup>其中的幻想之景,以仁学为本,突破国界,超越地球,融入浩渺无垠的太空之中——

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与仁之,远无所施。<sup>[11]310</sup>

在康有为笔下,自佛学东来之后,“乘光、骑电,御气而出吾地而入他星者”可谓变幻多端,层出不穷,时至近代,又与西学“格致”(科学)关联,致使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人类本身都为之改变,达到了“大同之极致而人智之一新也。”<sup>[11]300</sup>

这样的景象弥合了科玄之间的分野对立。于是尽管在文类上不是小说,与西方的科学也谈不上直接联系,但《大同书》的描写不但与晚清的科幻叙事“彼此印证”,<sup>[12]</sup>并且助长了由其折射的第三种文化——兼备了科学与玄学特质且将虚实合为一体的“文学超托邦”。此中的“超托邦”是对舶来语“乌托邦”的改用,“超”的含义,指向对现实世界的替代式超越。

## 二、当代科幻的知识目标及其跨界比较

回望历史,在虚实融合的实践层面,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绝非痴人说梦或纸上谈兵,而是以“超英赶美”的愿景为目标,实实在在地奋斗了上百年,时间跨越晚清至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数代政权。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廷创建彼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到民国元年(1912年)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创办铁路总公司,直至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1964年)首枚核弹在罗布泊核试爆成功,现代化中国的科技实践可以说跨入了与全球同步的历史新纪元。

在这样的进程中,由国家主导、上下结合,形成了现代中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全新意识形态,其中的分类包括“科研”(科学研究)、“科教”(科学教育)和“科普”(科学普及),与此同时,无疑更少不了自晚清便勃发并被认为能在救亡保种、科技兴国层面唤醒民众、激励人心的“科幻”——以文艺表达为主要方式和载体的科学幻想。

然而,由于主要以幻想现实呈现,且蕴含了玄学哲思乃至一定程度的批判精神,既触及科技深处

又与之若即若离的科幻可谓独具特色,其既非科研、科教,也不等同于科普,而是像归属不定的UFO一样,构建并成为悬浮于现实之上、之外的特异时空,生产着有别于科学实证与玄学空想的超验存在和第三知识。

1964年,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同步,童恩正完成了他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经过包括十年“文革”在内的跌宕埋没,小说终于在重建“四个现代化”的改革浪潮中,被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刊载出来。作品写道:

你们没有忘记双引擎飞机“晨星号”,不久以前在太平洋上空神秘的失事吧?从失事后新闻界提供的消息来看,当时飞机机件运转正常,与X港机场的无线电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好几个国家的远程警戒雷达都证明:当时,在出事的空域内并没有出现其它飞机,或任何类型的导弹。然而,“晨星号”却在八千公尺的高空发生了爆炸,燃烧的机体堕入了太平洋。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是:“驾驶飞机的陈天虹工程师下落不明。”

接下来,童恩正向读者揭示“我就是当时‘下落不明’的陈天虹”;继而开启了以第一人称讲述、围绕“高压原子电池”——未来激光武器关键部件之研发和争夺展开的科幻叙事。故事聚焦太平洋岛屿,情节关涉科技争夺;与此对应,主角出生国外,场景跨越中西,揭示了“冷战”时期“科学有国界”的现实壁垒。

童恩正是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学者,在中国的南方民族考古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但个人文理兼备的志向和经历,把他推向了有望将科玄整合的科幻领域之中。与此同时,新时期“改革开放”唤醒的“科学春天”亦为之奠定了良好的时代氛围。与《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的同一年,1978年,盛况空前的中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领导人发布了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宣言的发展纲领。“在‘科学的春天’里,科学家成为深受人们尊重和青少年效仿的新榜样。”<sup>[13]</sup>另一方面,一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作为“携带着幻想”的特殊文类,科幻创作并非对科学观念或科技知识的机械复制和宣传,非但不等同于传声筒式的科普,甚至“不会受到现代科学知识理性的束缚”。<sup>[14]</sup>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原本隐含在科幻界内部的认知分歧或手法选择,不仅派生出“姓科”与“姓文”的不同阵营,甚至引发了堪称现代中国第二次科玄之争的思想论战。论战结果与民国时期的“首战”相似,“姓科”派(以物理学家钱学森为代表)获得胜利,“姓文”派(以童恩正、叶永烈及郑文光为代表)惨遭败北。由其派生的后果之一是流行用语“科学幻想小说”中的关键词“幻想”被拿掉,被视为与现存科学知识悖离、不切实际的奇思异想被当成“精神污染”而清除,致使新时期复苏不久的中国科幻被人为限制在“科普”知识的单一圈子内跌入低谷,前景难料。<sup>①</sup>

如今看来,与民国时期的“科玄之争”相比,围绕科幻议题展开的新时期“科文论战”在思辨深度和社会影响方面都难以对等,这不仅因为彼此间的观点并不聚焦,更在于“姓文”派阵营只有文学界几位边缘作家单枪匹马,被动应战,缺少哲学界、思想界重量级人物的出场参与。客观而论,引发双方论争的缘由其实无关政治,而仍与彼此不同的知识论及价值观相关,即在经验实证、工具逻辑与虚拟想象和终极反思等方面的权重分野。双方认知的主要分歧在于:对于认识世界、形塑国民乃至改造社会而言,科学理念与文学幻想——以及后者关联的哲理思辨,是否各具特色?相互间能否并且必须互渗?

接下来,时间跨越到了21世纪。2014年,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英文版陆续在海外发行,一年后便夺得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成为获得该荣誉的亚洲第一人。<sup>[15]</sup>刘慈欣表述说,与分民族、分国别的文学不同,科幻面对人类整体,特点是:

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在已经实证的科学理论基础上进行思维。<sup>[16]</sup>

这样的事实表明了中国文学与思想界的一个新趋势,那就是,随着科幻成果以“新浪潮”<sup>[17]</sup>之势在21世纪中国“卷土重来”,前人遗留的知识目标被再度唤起,并通过科幻者们的不懈努力,“以更丰富的内容形式,刺激我们的想象,挑战形式

局限。”<sup>②</sup>

联系近代中国的科幻简史,科幻评论家吴岩总结说,梁启超时代开启的中国科幻已包括了一种“通往形而上学的文学。”吴岩认为,这样的形而上追求,不但成就了科幻,“也成就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比较而论,同时代的鲁迅强调了以文学做科普的形而下面向,由此形成科幻创作极具象征也极有魅力的“两极空间”,影响后世作家沿“梁式”或“鲁式”路径,通过相互不同又彼此呼应的科幻创作,担当“谋划民族和世界未来的责任”。<sup>[18]</sup>

结合世界文学谱系中的科幻实践来看,吴岩总结的两级空间是普遍现象,改用对称的术语来说,可称为“文学的科学”与“科学的文学”。前者属于科学一级,偏重以文学方式延伸科学——传播科学知识,构建科学话语,最终筑成左右全民生活的科学权力;后者则在文学之级,强调借科学外壳彰显文学——非但阐释科学、讨论科学,并且反思科学、干预科学,揭露科学(行业)弊端,质疑科学(技术)控制,一句话,从内部挑战科学,由外部注入人文。

此二者既各执一端又相辅相成,构成了两级互涉的科幻世界,如下图(其中的A表示科学,B代表文学):

(A) 科学  $\longleftrightarrow$  文学 (B)  
科幻文学  
(A) + (B)

然而上述图形仅为线性示意,实际的组合是无穷无尽的。若以交叉显示,此图示还可延展更为多样的重叠,从而提供更加丰厚的知识类别:

(A) 科学—文学 (B)  
AA BA  
AB BB

从“科学的文学”这级看来,作为“想象未有”的科幻叙事明显突出了玄学特征。在此,幻即玄,

①参见叶永烈:《科幻小说现状之我见》,《文学报》1983年1月13日;另可参见杨潇在1986年“银河奖”授奖大会上的致辞。

②王德威在为宋炜明著作写的序言里提到:“科幻小说在晚清风靡一时,到了二十一世纪卷土重来……”参见宋炜明:《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页。

连接着玄。也就是说,这一类别的科幻更多地包含了形而上思辨,延伸了超越经验的哲理内容以及延展幻想的美学灵韵。其借科学外壳开路,将虚幻(超验)种子孕育开来,借题发挥,左右突破,在接纳实证逻辑的同时,潜伏了以灵性(诗意)对理性(经验)的未来抗争。

这种以科幻显玄学的形而上特征,在韩松的作品里表现得相当充分。他的代表作之一《宇宙墓碑》荣获“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被认为是“技术文明视角下的启蒙重审”。<sup>[19]</sup>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其创作的意图则是“用科幻来表达对世界的感触的片刻时光中,参与人类对宇宙的终极思考。”<sup>[20]</sup>

可见,如果说玄学(形而上学、美学)的要义在于主体想象与灵性思维的话,科幻创作堪称保存了哲学思辨与审美自由的新玄学——玄学现代版,从而充当了连接科玄的中介桥梁,抑或突破了“科玄之争”及“斯诺鸿沟”<sup>[21]</sup>后的“第三文化”,也就是打通了科学与人文的新知识类型。

### 三、虚实并立的双主体和超托邦

在这意义上,以科学幻想为核心的科幻创作及其关联的社会再生产,其内涵和功能就不仅限于传授逻辑理性的科普成果,而已上升为兼容科学、玄学与文学的交叉知识,需要从知识论角度加以总结和阐释了。

怎样理解具有知识论特征的科幻创作呢?

需要回到文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认知原点。

1902年,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先声的“小说界革命”已经爆发。先驱者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小说,也就是英文对应的 fiction,誉为“文学之最上乘者”,强调其特点在于使人超越“现境界”,进入“他境界”,也就是由“以触以受”的局限脱离出来,唤起“身外之身”,抵达“世界外之世界”。<sup>[22]</sup>

梁启超的小说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文学知识论,其以文学为媒介,分离出虚实并立的双主体和双世界,一面是感知现实和超越现实的双重主体,另一面则是有限经验的“实存世界”及无限

想象的“文学世界”。二者互为补充,可连成整体,但相比之下,梁启超认为由身外之身所关涉的“世界外之世界”更能打动人心,移人性情,“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sup>[22]</sup>

由梁式小说观继续推衍:后来兴起的科幻创作因搭载了科学翅膀,以各种已有和将有的技术器物为依托,在创造“世界外之世界”方面上天入地,时空倒转,既改装古今神话,又直抵无人之境,非但虚幻无比并且比真实还真,似乎就要成为文学大本营中“上乘之上乘”了。

然而究竟什么是世界外之世界呢?梁启超语焉不详。

百年之后,新时代的科幻论者将此再作延伸。有学者结合现代西方的“玄学”表述,把科幻创建的知识景象比喻为“异托邦”或“异世界”。<sup>[17]</sup>

王德威以鲁迅到刘慈欣为主线,勾勒中国科幻的百年历程,认为其所呈现的脉络便是“不断地在乌托邦和恶托邦之间,创作各种各样的异托邦”。<sup>[9]</sup>

“异托邦”(heterotopias)的提法源自米歇尔·福柯。这位20世纪的法兰西思想家对“乌托邦”(Utopia)一词加以移用,使其本有的时间指向扭转,用以揭示人类依照区隔场域、规训他者之需在现实社会创造的另类场所。<sup>①</sup>在福柯之前,“乌托邦”更多与时间相连,寄寓着人类对未来的进化期许。福柯将时间折断,转向共时的空间,用异托邦指涉人类并行的另一种共在,揭示权力通过包含观念和实践的话语改变人、改写世界。

照这样的模式分析,刘慈欣的科幻便被理解为异托邦的一种体现,一种人类文明的空间样态与存在类型。然而即便可做如此理解,刘慈欣的作品却不得不说展示了对福柯的超越。在其构建的幻想世界里,刘慈欣突破现实的民族国家边界,让整个人类成为一种空间,不仅让地球“流浪”、太阳“死亡”,甚至让银河记忆也“降维”成永远消逝并永难复原的图片。因此与其将刘慈欣等科幻作家以文字构造的科幻世界称作“异托邦”,不如视为“超托邦”更为恰当,因为其中展示的地方、空间或场域都

①参见福柯:《异托邦》(Michel Foucault, *Des espaces autres*, 原载 *Dits et écrits* 1954—1988, Gallimard.) 汉译本可参见王喆译:《另类空间》,《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另可参见汪行福:《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与批判》,《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已不限于与现存世界的对比、对抗或反叛,而是借助文学想象和虚拟的远离、遗忘,乃至扬弃、重塑,也就是超越实有,另起炉灶。

在人类学的体系里,有关时间的知识以达尔文的自然演化为代表。其中,在空间确立的框架里,时间展现为严复概括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轨迹。这样,相比于达尔文用科学话语构建的物种起源学说,堪称文学超托邦的科幻创作可谓在未来已来的意义上做了解构——演化到头,生命终止。进而言之,如果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揭示了人类世界的“演化知识”的话,力图将人类编年史视为“地球往事”的科幻叙事则开创出与之逆反的“知识倒进”。彼此都从科学出发,结果却相去甚远。其中原因就在认知范式的差别,一个是科学知识论,一个是科幻知识论,一字之差,区隔万里,既相互映照,又各显神通。

在刘慈欣的虚拟中,《地球往事》三部曲的开篇部分以“科学边界”为题,演示了一场重要的跨国会议。主持讨论的少将先是暗示“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偶然”,接着对科学家说:“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偶然,从石器时代到今天都没什么重大变故,真幸运。但既然是幸运,总有结束的一天。”最后以预言式的口吻,披露了全篇主题:

“现在我告诉你,结束了,做好思想准备吧。”<sup>[23]</sup>

可见,作为人类叙事的现代类型,科幻创作的突出特征并非求真写实,而在构建虚拟,在于认识论上的“见所不见”及知识论上的“言所未言”。

1999年,兼具数学博士与科幻作家于一身的约翰·卡斯蒂(Casti, John L)将“机器能否思考”科学论争叙述成一次学术宴会,让时间层层倒转,以在1959年引发“两种文化”之争的斯诺为主角,通过文学虚拟方式,邀请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遗传学家霍尔丹及现代计算机的主要推手、数学家图灵集体出场,在1949年的一个晚间齐聚剑桥,上演了观点交汇的“思想五重奏”。<sup>[24]126</sup>

卡斯蒂把他的剑桥五重奏称为“科学幻想”(或“科学虚构”),也就是英文表述的 Science fiction。虚构的特点是对历史进行重塑,把事实纳入

想象,用文学舞台展现可能世界,生产科幻结论,亦即知识的知识。

与卡斯蒂的文学虚构形成对照,现实的聚会未曾发生,各位科学家的结论不得而知。作品结局是,晚宴嘉宾纷纷离去,作为主人的斯诺独自留下——

他舒展了一下身子,然后将灯一一熄掉,进了卧室。思维机器之谜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解决,他想。明天,将又是新的一天。<sup>[24]126</sup>

时空转换。新的一天似乎已经到来。

2019年。日期不明确的某一天。星际太空,茫茫孤寂。编号267的宇航员因设备故障而陷入氧气危机,但自我解救的过程却因违背程序而遭“系统”(人工智能)阻止,孤寂绝望,命在旦夕。经过与系统的反复沟通,267获知自己是伊丽莎白·汉森博士,并通过屏幕投射看见了自己的图像踪影,却分辨不清是大脑记忆还是数据回放……于是,“伊丽莎白-267”开始挣扎,极力呼喊“救命!救命……”。

这是法国科幻片《氧气危机》所作的虚拟描绘。接下来,当太空舱内的氧气将尽之时,女主人公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件被用作星际航行的试验产品,一具人工制造的仿生人,眼前所见,或脑中所及皆只是被植入的预写程序而已;与此同时,观众也才明白,眼前所见其实是一部采用双重叙事的科幻作品。<sup>①</sup>

在该影片中,创作者通过叙述被叙述者的叙述,让观众见识了仿生人的见识。这样,由于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科幻编导赋予“异人类”以看和说的能力,也就是意识权力。

那么,面对以科学幻想为基点的电影作品,这是谁的故事?谁在讲述?讲给谁听?谁得见了?作品体现了什么样的知识及其生产程序?

依照卢西亚娜·帕里西(Luciana Parisi)2018年发表的观点,日益涌现的科幻影片已成为科幻知识的一种生产方式。她将《2001太空漫游》与《机械姬》等作品称为对人工智能议题的“电影化阐释”,认为其中的主人公Hal(“硬件抽象层”)和Ava(叙事性“夏娃”),其实是借助“具象化的思考

①参见影片《Oxygen》,中译名《氧气危机》,编剧Christie LeBlanc,导演亚历山大·阿嘉;法国2021年出品。

模型”支撑了一个强力的人工智能论点,即“机器能够胜过人类的智力”。<sup>[25]</sup>

于是,还要继续深究的问题是:

——什么是现实与知识的“所不见”?为何不见?又如何得见?

——如何发现“所未言”?如何言?

通过对以上科幻案例的跨文化比较,初步结论如下——

1) “见所不见”的根本是想象,想象就是见所不见;

2) “言所未言”的方式是虚拟,虚拟就是言所未言;

3) 科幻的魅力就是“使其见”。

此中的“其”,既包括只有借助仪器才能呈现的原子、基因、病毒、红外线、超声波,亦涵盖全凭想象得以窥视的“超人”“三体”“黑镜”,以及《星球大战》《盗梦空间》《北京折叠》《爱、死亡和机器人》……总之就是被科学幻想以科玄并置方式构建出来的虚拟世界和可视未来——寄予了人类反思、理想和批判的文学超托邦。

#### 四、结语

晚清末年,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Utopia)被引入汉语世界,激发了世人对另一类可能世界的关注和幻想。严复解释说“乌托邦者,犹言无是之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自那以后,汉语世界开启了借用“托邦”之义而展开知识再生产,延伸出了词语与想象意义上的“托邦”系列。有人认为,就莫尔描绘的“理想国”景象来看,乌有只是表面,美好才是实质,因此应改称“优托邦”才对。<sup>[26]</sup>随着时代的演变及所指的增添,在中西交汇的整体格局中,又接连涌现了“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等说法,不一而足。

结合本文关注的议题核心,可以说科幻塑造的想象之地既是一种“托邦”,也是一种“玄”,是结合了玄妙意境的“超托邦”。尤其有意思的是,由于主要依托语言符号的媒介生成,科幻创造的超托邦,无论其以小说、戏剧还是游戏、卡通或网络剧、故事片的面貌呈现,其实都是一种虚拟界面,是不可真

实进入的想象视界——如钱学森所说的“灵境”<sup>[27]</sup>。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来自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的代表杨潇,在发言中强调了学界对STS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关注和阐释,故而把科幻的注意力提升到了更高的跨界层面。不过其对此关联的中西差异却存在见解上的偏颇。杨潇的看法是,由于科技水平已进入“发达”之列,西方国家的科幻便获得了“以对科技负面的批评为出发点”的特权;与之相比,中国科技还处在“发展中”,因此对应的科幻任务只能是加大科技宣传,“唤醒公正的科学意识”,也就是继续科普。<sup>[28]</sup>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等于把对科幻的认知又拖回到了早期“科玄之争”的话语误区,遮蔽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由科学幻想出发的完整探寻、论辩和阐发。次年,在《科幻世界》任主编的作家阿来,发表了与杨不同的论点,强调在承认科技发展的前提下,坚守科幻写作的人文立场。阿来写道:

科学的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没有办法、没有人能阻止这个趋势,但是我们人文和写作依旧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去反思一个科技的诞生会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sup>[29]</sup>

对此,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由张君勱“清华演讲”引发的“科玄之争”与之后斯诺“剑桥演讲”激起的“两种文化”东西对应,意味着中国知识界正式进入世界史场域,21世纪再度博兴的中国科幻及其与神话叙事的关联,则标志了本土创作以科玄并置的超验想象深度嵌入了渐为整体的世界文学。其中的意义,既可谓叶舒宪强调的“幻想引领人类,神话催生文明”,<sup>①</sup>亦可为笔者从科幻人类学出发提出的“反面神话”说。<sup>[30]</sup>

2021年6月17日,中国“天问一号”航天飞船承载的“嫦娥”登陆器在火星降落成功,标志着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迈入了飞往星际的太空时代。美国“太空评论”网站随即发表评论,称“中国正在使用神话和科幻向世界推介太空计划”。<sup>[31]</sup>在此,现实中国的科技实践者将屈原诗话与奔月神话结合至星际探测的科学表述体系,国外媒体又将其与跨

①叶舒宪、徐新建、杨骊:《古蜀文明里的幻想世界,如何与现代科幻衔接?》,红星新闻网,2022年9月2日, [https://www.sohu.com/a/582025069\\_116237](https://www.sohu.com/a/582025069_116237),另可参见叶舒宪:《2019,复活“鸿蒙”》,《文艺报》2019年11月28日。



文化的国际表述相互关联,从而生产出有关太空的知识对话,形成古今相连的知识的知识。

随着当代中国的科幻拓展,在思维与实践的发掘意义上,与数智文明相呼应的新文学知识也日益创生。<sup>②</sup>伴随着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及“后人类”随时面临的挑战压力,由人类幻想为媒介,不仅科学与玄学重新结合,甚至人智、数智与神智亦可望以虚拟方式遥相呼应,跨界联手。<sup>[32]</sup>

#### 参考文献:

- [1] 张之洞. 劝学篇[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
- [2] 李泽厚. 漫说西体中用[J]. 孔子研究,1987(1):15-28.
- [3] 张君勱. 人生观[M]//张君勱,丁文江,等. 科学与人生观. 长沙:岳麓书社,2011.
- [4] 胡适. 序言[M]//科学与人生观. 长沙:岳麓书社,2011.
- [5] 丁文江.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勱的《人生观》[M]//科学与人生观. 长沙:岳麓书社,2011.
- [6] 王时中. “科玄论战”的百年回眸——从方东美的了结方案切入[J]. 天津社会科学,2019(4):14-21.
- [7] 刘钝,等. “两种文化”:“冷战”坚冰何时打破[N]. 中华读书报,2002-02-06.
- [8] 武田雅哉,林久之.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上[M]. 李重民,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 [9] 王德威. 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N]. 文艺报,2011-06-03+2011-06-22+2011-07-11.
- [10] 梁启超. 求新学三大洲环游[M]//新中国未来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11] 康有为. 大同书[M]. 章锡琛,周振甫,校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 [12] 田雪菲. 解除“围困”的救亡神话——晚清科学小说新论[J]. 科普创作,2020(1):62-68.
- [13] 张柏春. “科学的春天”意义深远[EB/OL]. (2018-05-28)[2023-05-04]. 中国科学院官网. [https://www.cas.cn/zjs/201805/t20180524\\_4647140.shtml](https://www.cas.cn/zjs/201805/t20180524_4647140.shtml).
- [14] 刘阳扬. 科幻小说与“新时期”文学——《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前后[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8):194-205.
- [15] 中国作家网. 作家刘慈欣获雨果奖,成亚洲获此奖项的第一人[EB/OL]. (2015-08-25). <http://www.chinawriter.com.cn/kehuan/2015/2015-08-25/251671.html>.
- [16] 刘慈欣,吴岩. 《三体》与中国科幻的世界旅程[N]. 文艺报,2015-09-25.
- [17] 宋炜明. 中国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 [18] 吴岩. 科幻文学的中国阐释[J]. 南方文坛,2010(6):25-28.
- [19] 詹玲. 技术文明视角下的启蒙重审——谈韩松科幻小说[J]. 中国文学批评,2019(4):141-148.
- [20] 韩松. 韩松精选集[M].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 [21] C. P. 斯诺. 两种文化[M]. 纪树立,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4.
- [22]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 新小说(创刊号),1902(11).
- [23] 刘慈欣. 三体 I[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
- [24] 约翰·卡斯蒂. 剑桥五重奏[M]. 胡运发,等,译.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25] 卢西亚娜·帕里西. 后人类关键词:人工智能[EB/OL]. 马峯,译. “科幻世”公众号. [2021-03-13/05-16]. [https://mp.weixin.qq.com/s/ABaurgx\\_4RK78kDVXAKDvA](https://mp.weixin.qq.com/s/ABaurgx_4RK78kDVXAKDvA). <https://mp.weixin.qq.com/s/COUdOewPydJ35oAtV2t4A>.
- [26] 高放. 《乌托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关于翻译史及其版本的学术考察[J]. 中国社会科学,2017(5):181-204.
- [27] 张辉. 从钱学森对VR的译名看科技译名的“中国味”[J]. 中国科技翻译,2020(1).
- [28] 武田雅哉,林久之.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下[M]. 李重民,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244.
- [29] 阿来. 走进科幻[J]. 科幻世界,1998(7):64.
- [30] 徐新建. 反面神话:科幻人类学简论[J]. 孔学堂,2023(1):17-26.
- [31] 腾讯新闻. 美媒:神话和科幻小说打造中国太空文化.[EB/OL][2021-07-15]. <https://new.qq.com/omn/20210715/20210715A00MZ500.html>.
- [32] 光明网. 神话与科幻:通往过去与未来的人类叙事.[EB/OL] 光明网公众号. [2022-09-09]. [https://share.gmw.cn/topics/node\\_146707.htm](https://share.gmw.cn/topics/node_146707.htm).

[责任编辑:郑迦文]

②徐新建:《人类学与数智文明》,《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第50—59页;《数智时代的文学幻想》,《文学人类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总第3辑。